

杜惠和郭小川始终如一的爱

杜惠生于书香之家，在高中期间入党，后只身赴延安，与著名诗人郭小川热恋。在郭小川和杜惠次女郭晓惠的眼里，母亲的人生经历曲折，充满传奇色彩。而父母的爱情始终如一，两人相扶相守了一生。

等到了“平等的爱情”

我的母亲原名邓蕙君，1920 年 3 月 7 日出生于四川长寿县城关镇邓家巷子，家族五六十口人共住一个大院，她从小就淘气倔强，像个“儿马婆”（假小子）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母亲考入成都的省女中，在此加入抗日救亡宣传队。1939 年 3 月 14 日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读到高二时，她知道女学生毕业后就业很难，嫁人作妾又绝非她所愿，就想上前线打鬼子，或去延安。通过党组织的安排，她于 1939 年深秋只身奔赴延安，改名换姓为“杜惠”，在中国女子大学和西北公学学习近六年。

到延安后，清秀而高傲的母亲也不用好心人介绍，要自己寻求或等待平等的爱情。后来，她接受了父亲郭小川，她说这个当过几年八路军战士的青年诗人“谈吐高雅，内有才华，感情深沉”，诗歌成为两人“心灵上的红丝线”。父亲也爱她的勇敢、“思想火花”和性格上的“棱角”。

热恋一年多后，1943 年春节他们举行了简朴而喜庆的婚礼：父亲用黄泥土在窑洞里堆了一对沙发，铺上老羊皮，母亲把吴玉章老人书写的喜联“杜林深植蕙，小水汇为川”贴到墙上，

这就是新房。伙房抬来一大洋铁桶红枣绿豆粥，这就是喜宴。新人入洞房盖的被子，被里被面是吴老用旧的、该淘汰的细白布，这就是珍贵的贺礼！

在火红的年代热烈相爱

1945 年秋冬，我父母先后被派到父亲家乡热河省东丰宁县工作，父亲任第一任县长，母亲任县妇联主任。一个南方姑娘到了北方，睡冷炕，吃小米和杂和面，就着盐水野蒜。

1946 年秋，国民党军进占热河，父亲到热西开展游击战，怀孕八个月的母亲随家属队乘坐牛车向东北方撤退。道路崎岖颠簸，她滚下牛车掉到一个坑里，车轱辘从她胯骨处压过去，险些伤到胎儿。到了内蒙古林西县，母亲生下我哥，之后她在战乱中一边独自带孩子一边工作，还得躲避鼠疫。与此同时，父亲在一些区小队叛变、数十名干部战士被杀害的情况下坚持剿匪和进行土地改革，两次被敌人包围，侥幸生还。待父母久别重逢，孩子已经一岁零七个月大了。以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为基础，父亲创作了长篇叙事诗《白雪的赞歌》。

1948 年夏，母亲开始从事党的宣传工作，先是任职于热河《群众日报》。天津解放后，他们在天津日报社工作，后又被调往武汉，任职于中南局宣传部。

1953 年春，我父母调回北京，先在中宣部工作。母亲 1958 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。

母亲作为少女时美而不自知，青春时清秀、自爱、勇敢、坚强，中年时美

丽而健康，身材匀称，个子不高，常穿半高跟鞋，有一种素朴中的优雅。夏天她喜欢穿裙子，有条淡蓝灰色半身裙穿了多年。她会自己改衣服，自己缝制无领无袖的丝绸布拉吉。

20 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每天上班，家中有我姨姥姥和姑姑做家务、照顾孩子。当时我们家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一个四合院里的东跨院，院子里有花草，还养有鸽子、鹦鹉、小兔等小动物。父亲工作（在中国作协七八年，任作协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，后调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）极为忙碌，白天上班，夜晚写作。母亲往往是父亲诗歌的第一个读者。难得的闲暇时间，他们会带我们三个孩子游泳、滑冰或去公园游玩。父亲经常照相，在长有一棵枣树的小后院里冲洗照片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瞬间。

“有个最幸福、美满的爱情”

特殊年代，母亲特立独行、不愿被束缚的天性不改，几次说“错”话，导致她多年挨批，被降格使用。她的温柔母性渐失，变得难以沟通，缺乏理解和慈爱，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机器。

在生活上，她也标新立异，不同于常人。那些年，她会把衣柜的隔离板锯成两截当案板，会让我们吃涮羊肉蘸沙拉酱，会因一篇报文就把床从东西向挪成南北向，会说有“剥削”的嫌疑辞退父亲因病请来的小时工，会倒掉我好不容易腌好的雪里蕻，会禁止我们吃松花蛋、生姜等。她的种种奇行怪癖把我们搞得哭笑不得。那些

年，我在她面前尽量不言不语，甚至躲避她。

父亲去世前的十年里，母亲对他是有关爱却不能通“心”。父亲受审查期间，她数次探望，一下汽车就拆洗被褥，打扫房间，清理灰尘、烟头、药瓶和满桌的纸页。她努力给父亲做思想工作，反复劝慰，但就是话不投机，无法沟通，致使父亲敬而远之。

但她对父亲的爱始终如一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他俩的情书多达数百封，她晚年还说“我一生有个最幸福、美满的爱情”。1976 年父亲早逝时她 56 岁，在此后漫长的四十几年她从未有过感情的动摇，而是日复一日地收集、保存和整理父亲的遗稿和大量有关资料。她把父亲的文稿大部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。她支持家乡丰宁县和承德市办起“郭小川研究会”并出书出刊。老家凤山镇人至今记得六七十岁的她整天坐在一个小板凳上，一张一张地撰写图片说明，为“郭小川故居”筹办父亲生平展。

多年来，我越来越走近父母这一代人，也越来越多地理解母亲。他们其实是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情怀的。他们看淡生死，又相信未来。母亲是老革命，一辈子相信共产主义；她是好人，一辈子相信人。

母亲活到了百岁，她的一生没有憾事。在遗嘱中，母亲这样写道：“我带着爱和微笑去拜见马克思。值得骄傲的是，我一生未说过一个字的假话，一生未贪过一分钱财……” 遗稿似未写完，余音不绝，飘彻天际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郭晓惠/文

1000 年前的纸币怎么防伪

据《宋史》记载，“官交子”发行不到 20 年，市面上就已经出现了“伪交子”，扰乱市场经济，各地转运使一度“欲废不用”。

宋朝政府首先从原材料入手——原材料只用楮皮制成的川纸。古人把这种楮皮制造出来的纸币称为“楮币”或者“楮券”，在当时只有朝廷掌握着这楮皮的物源。由楮皮制作出来的纸币成色高阶，非伪造纸币能比，因而可以一眼辨认出纸币真伪。

但随着民间技术的发展，很快，这个问题已被造假者攻克。于是元代，则更进一步，把私购制钞用纸定为大罪。《马可波罗行记》里记载，元朝的纸钞用纸为桑皮纸，不仅墨韵层次鲜明、难以仿造，民间若有私自采购者，处以极刑。

除了从源头解决问题，古人对于纸钞的印刷防伪也极为重视。早在唐代，成都人已发明了“水纹纸”，分明、暗两种印花，其他地区根本造不出来。现代纸币上的水印防伪技术，源头就是这里。

辽宁博物馆藏有一件北宋交子旧版拓存，是由清代研究人员用制作交子的原始印版拓印的，目前我国仅此一件，是国内研究纸币发展史的唯一实物资料。它竖长形的版面分为三个部分，上部有十个方孔圆钱符号，彰显货币属性。中部整齐排列 29 个字：“除四川外，许于诸路州县公私

从便主管，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行使。”大概意思是：“除了四川地区以外，允许在诸路州县，官方和民间的交易均可，经手钱钞者将其视同现钱七百七十陌，流通使用。”短短 29 个字就规定了流通使用的地区、场合及币值，下部刻有宋代风俗画，这就是当时的“防伪标志”。

古代纸币的图案往往极其复杂精美。票面图案通常雕刻有房屋、树木、人物故事等精细内容，线条繁复，称为“屋木人物”。雕刻这样的图案需要高超的技艺，模仿难度极高。

印刷的色彩也可以用来实现防伪。除常见的红、蓝、黑配色外，套印花纹图样就可以形成较难复刻的多色票面，防伪性能很强。更重要的是加盖大量的官方印章，包括发行机构的印章、骑缝章、面额章等等。伪造者要同时伪造这么多不同印章的印文和印色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

古代纸币票面上常印有隐秘的密码、花押（签名画押的特殊符号）或暗记，这些只有官方内部人员才知晓其含义，作为验证真伪的关键。此外还会定期换版。每界（两三年）发行新一界的交子，图案、文字、印章、暗记等都会重新设计更换，旧版作废。这大大缩短了伪造者研究仿制的时间窗口，有效降低了长期伪造的风险。这些综合手段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构成了相当严密的防伪体系。

陈品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克作